

二、政府、自民党、佐藤派、财界

统治一九七〇年代日本的，不是一个政府，也不是一个派系，而是政府、自民党、派系、财界、官僚五位一体的集团。这些集团相互依存、紧密结合，把日本人引向了“曾经走过的老路”。

1. 继续无视宪法的保守党政府

无视宪法二十八条的“不法之徒”

战后日本的政治史仍然是保守党内阁的政治史。从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四日起持续了十个月的社会党内阁不是保守党内阁。可是，半数的官僚后来纷纷走向自民党方面，果真能说是革新政府吗？因此，战后的政治史仍然是保守独裁的历史，这种看法是正确的。

战后保守党内阁的政治是从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二日成立的日本自由党并由它产生的第一次吉田内阁开始的。以后有第二次——第五次吉田内阁、第一次——第三次鸠山内阁、石桥内阁、第一次——第二次岸内阁、第一次——第三次池田内阁继续一直到后来的佐藤内阁。像这样在实质上统治战后日本的保守党内阁，具有什么样的特征呢？如果说岸、佐藤内阁是以“政治优先”，那么池田内阁是以“经济优先”而各有各的特征，虽有细微的差别，但却有个共同特征，那

就是同和平宪法背道而驰，这在保守党内阁来说是一致的。和平宪法是体现了国民意愿的日本国根本法典，保守党内阁继续不断地无视和平宪法就是保守党内阁继续不断地无视国民期望的民主要求。

那么在这里我们就看看战后保守党内阁是怎样具体地无视宪法的。

如谈到一九四七年一月，那正是临近二·一大罢工之际，工人运动走向高潮的时候。二·一大罢工是以二百五十万官公厅职工为中心，为要求提高工资而举行的大罢工，这在当时来说既不违法也不犯法。对此，吉田首相在一九四七年元旦的无线电广播中骂劳工运动的领导者是“不逞之徒”。为什么骂要求提高工资的工会领导人是不法之辈呢？在二·一大罢工之前就向二·一大罢工的领导人发出这样的恶语，只能说明吉田首相已经走向了否认宪法第二十八条规定保证工人的团结、集体交涉、集体行动权力的道路。就这样不知何时由“解放军”变成了“占领军”的驻日联合国军总司令官麦克阿瑟凭着一纸书信就在一九四七年七月剥夺了官公厅工人的罢工权和集体交涉权。

不久在朝鲜半岛上以分隔南北的三八线为界，南方的南朝鲜（进驻美军）和北方的北朝鲜（进驻苏联军）之间出现紧张局面。见于这种情况的美国为结束对日占领状态急于单独对日讲和。对此，东京大学校长南原繁氏等批判说：“同美国单独讲和，自然就把苏联当成敌人了，这对日本未来的和平是不可取的”。听到这个批判的吉田首相（自由党）在一九五〇年五月的自由党众、参两院议全体秘密会议上指名申斥南原氏为“曲学阿世之徒”。南原氏等人的反对单独讲和论颇得国民支持，从言讲自由（宪法第二十一条）的原则

来说，南原繁氏的言行毫无问题。批判南原氏、压制言论自由的吉田氏，违反宪法的态度才应该追究责任，才应该受到谴责的。

“没有战斗力军队”的诞生

朝鲜战争的暴发，正中吉田首相想正面向宪法挑战的下怀。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战争刚开始。麦克阿瑟即向吉田首相发出指令（七月八日）：建立七万五千人的警察守备队，海上保安厅增员八千人，首相也答应了。当然在野党对此严厉追究：“从警察守备队的装备来看，是违反宪法第九条的军队”。社会党左派的铃木茂三郎警告说：“青年人可再不能拿枪啦！妻子哟可不能把丈夫再送到战场去啦！”国民都有这样相闻的感触。回答这个问题的吉田首相却说那是“没有战斗力的军队”。当时（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三日）在议会上首相安慰说：“……即便有军队的意思，也不想搞有任何战斗力的军队”。政府的见解是：“宪法第九条是禁止有‘战争力量’，警察守备队从装备方面来看没有达到有战争力量”，打算不搞有战斗力的军队即“无战斗力的军队”来支吾搪塞。

吉田首相的违宪态度影响了其所属的阁僚。在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七日的参议院税务委员会上，池田首相（后来是首相）答辩说：“虽然现在的日本人都吃同样的东西，回到古来的习惯，收入多的人以吃米为主，收入少的人以吃面食为主”。这是一个叫做“穷人吃面粉”的答辩。池田的发言不用说表明保守党内阁是以“保护有钱人”为目标的。该池田氏于一九五二年成为通产相以致发表了“中小企业尽管死五个人和十个人……”的如下失言：

“明确的说，从经济膨胀走向经济安定时，黑市等违反

普通经济原则搞不适当的投机生意破产五个和十个人……（‘就是死了也好吗？’会场内发出了强烈的怪叫声，场内骚动起来了，池田通产相反复答辩）由通货膨胀经济走向安定经济之际，搞黑市活动啦，由于搞不正常的经济原则而破产啦，虽然有由于破产而自杀者是可怜的，但也是不得已的。”

如按着法律经营经济生活则贫困，当时的通货膨胀的旋风十分严重。通货膨胀也是吉田内阁保护大企业和对美从属政策带来的结果。自己的责任往哪儿推。像池田通产相前面那样的答辩是残酷无情的。这样以来在国民极为愤怒的情况下，池田最后还是引咎辞职了。

核武器也符合宪法吗？

就这样警察预备队发展成为一九五四年自卫队，于一九五七年二月，内阁的接力棒便交给了原来的甲级战犯岸信介氏。岸信介首相的本质从经历来看传说比吉田首相更“右倾”，果然就任三个月就侈谈“在自卫权的范围内保持核武器也是有可能的。”（五月七日在众议院内阁委员会上说）。

正像这个岸内阁成立时开场节目那样，一九五七年二月五日，自卫队发生了死亡行军事件。陆上自卫队第三管区（伊丹）、让自卫队员施行从开始的三十公里携步枪等军装行军到总行程七十七公里的行军演习。由于正赶上下雨和残酷的行军，年轻的队员由于空腹和疲劳而在路上倒下了。对此，当时的干部还拿青竹棍子打，用脚踢，说是“没有根性的队员”？其结果，二个队员终于死亡了，当时的桥爪幕僚长对新闻记者发表了如下讲话。

“两位队员的行为是死而后已的勇敢战斗精神发扬光大，是全体队员借鉴的镜子。对两位队员的“英灵”以及家

属表示衷心哀悼之意”。

好厉害呀！对于干部们强迫极无人性的作法佯作不知，却用祭祀死者的英灵来鼓舞队员的士气。一九六八年，陆上自卫队少年工科学校的学生十三人淹死了。这是由于当时的田村少尉让那些无辜的少年们背上沉重的装备，泅渡最深三米的水池子所造成的。对于这个死亡事件，政府首脑和自卫队干部唯恐影响队员的士气在追查与该事件有责任者实际上给予了宽大处理。

由于岸内阁同美国加深了勾结，就露出了对社会主义各国的敌对意识。一九五八年十月十四日，岸首相对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记者赛西尔·布劳恩提出的问题回答说：“中国是侵略者所以不能承认。……日本为了防止台湾和韩国被共产主义者征服，在可能的限度内要做出一切努力。为了对日本的安全决不允许那种事情发生。台湾海峡的形势不是内战。那是对共产主义侵略的国际性斗争”。在战前侵略过中国的岸氏等是“新进官僚”。同他们结合的是“陆军”。连自己作为侵略者的责任都不知在哪里，把中国大陆的内战斥责为中国侵略的岸首相的感觉，同在东条内阁之下执行侵略中国当时的“岸商工大臣”没有变化。尤其是岸信介还说：“为了保卫来自共产主义的侵略，自卫队也可以向海外派兵”，按岸信介这种想法好像宪法第九条已不存在了。像这样的岸信介作为今天佐藤首相的胞兄对于佐藤政府反动化不能不是一大贡献。

继岸内阁以后的池田首相，专门用谦恭姿态和经济优先来对待国民。池田不像过去用“吃面粉发言”“死五人或十人的发言”来刺激国民，而是走上了积累过去既成事实的道路。池田首相不用正面发言的办法来否定宪法，而是代之以

着手进行真正的防卫力量增强计划的第二次防卫力量整備五年计划（一九六二年度——一九六六年度），在实质上否认宪法，其意义在于修改宪法由鸡山提起，经岸内阁改恶，到池田内阁的“迂回政策”，只不过是限于口头而已。

区分战后的佐藤内阁

池田首相突然死亡（一九六四年）后，同年十一月九日佐藤荣作在国会被指定为首相。建立之初的佐藤内阁也有对池田内阁继承的东西，提唱“宽容和调和”等乍一看是谦恭的态度对待国民。

可是，一九六五年二月，美国要对越南北方进行轰炸，同年五月，佐藤首相在出席的自民党青年部全国大会上说：“美国轰炸北越是有理由的。被轰炸的北越也是有责任的”，表明支持美国轰炸北越。就这样在同年十月，说是为了台风避难而从关岛移驻冲绳的B52战略轰炸机开始向越南进发。当然关于这个问题革新阵营以“对冲绳有潜在主权的日本有捲入越南战争的恐惧”而对此进行了严厉批判。然而，首相却说：“美军从冲绳出发是理所当然的权力”，于同年十一月不顾革新阵营的激烈的反对运动，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强行表决通过了日韩条约。从这时开始佐藤内阁对人民采取“对立和挑衅”的姿态，以至后来的庆祝节日法案（一九六六年）、防卫二法、健保特例法（一九六七年）、大学法、健保法（一九六九年）等反动立法，都是采取以多数力量为后盾强行通过的。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的首相访美使我国对美国更加接近一步。在当时的佐藤·约翰逊会谈中，解决了小笠原群岛的归还问题，关于冲绳问题取得了“在把行政权归还给日本的方针下，关于冲绳的地位双方继续共同进行协商”的一致意

见。以此为契机，首相在美国新闻俱乐部“支持越南战争的发言”，回国后鼓吹国防意识的发言，这一系列右倾化的迹象把日本国民推向战争的不安的边缘。政府、自民党首脑也同首相的右倾化发生了共鸣。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日，在华盛顿的晚餐会上驻美大使下田说：“日本大多数国民冷静地支持美国对越南的政策，轰炸北越是阻止向南方增兵的必要想法”。福田干事长也于同月十四日说：“我认为自民党内大多数以及政府和国民都认为应该摆脱核过敏症状态。虽是极少数，我国也应该有核武器”，做了个摆脱核过敏症状态，主张有核武器的发言。这些发言是超越在岸内阁当时谈论保有核武器是否符合宪法的法律论，现在是具体的直接端出了核保持论。基于这样的政治路线，一九六八年一月，美国核动力航空母舰企业号开进了崎县长佐世保军港。允许载有核武器的军舰入港仍然意味着对我国输入核武器的意思，政府制定公约，“不保持核武器、不制造核武器、不输入核武器”的无核三原则，却被自己亲手破坏了。就这样战后培育和平宪法的土壤终于被掘坏了，这就可以说从根本上毁坏了佐藤内阁。

因需要而出笼的“仓石发言”

佐藤首相的右倾化方针由其所属阁僚加以忠实地执行。

第一是防卫力量的增大。一九六九年度的防卫关系费大约四千八百亿日元，这相当于十年前的一九五八年的二倍还多，较五年前一九六四年度的增加了百分之七十五。以这样高的速度来增加国防费用的国家在世界上是没有先例的。可是，阁僚们对这样飞跃增长的国防费用仍然感到不满足。一九六八年二月六日，仓石农相同纠缠于普埃普罗号事件，端出了与日本海安全捕渔相关连也留给后世的“仓石发言”。仓

石在回答记者团的质问时说：“我国的宪法信赖别国的信义，这虽是维持我国和平和安全决定因素，可是，这是专靠外力支援，还是保有军舰和大炮，自己的国家由自己来保卫的自主防卫力量是重要的。日本也应有原子弹和三十万军队……。佐藤首相也因为有和平宪法而感到为难吧……。”

这个发言通过报纸、电视传给了国民，在野党，特别是社会党、公明党要求“罢免蹂躏和平宪法的农相”，在国会中拒绝进行审议。出于无奈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审议一九六九年度预算中，佐藤首相也急忙出来收拾仓石发言。为此，仓石农相本身也表示辞意说：“耽误了国会审议，给佐藤内阁带来了麻烦”，总算平息了那场混乱。不过仓石的信念没有变，在提辞呈后的记者招待会上，认为自己的发言是正确的：“今后尽管作为一个党员也想为宪法的修改问题作出努力”事实上，佐藤内阁、自民党首脑对这个问题的发言比仓石的发言“表现更为恶劣”只不过是“没注意”而已。

同样，一九六八年六月，增田防卫厅长官访问长崎县对马的陆上自卫队基地时，发出了像旧时代一样的训示。——

“在日清、日俄、太平洋战争时代，天皇把国民当作“天皇的国民”加以尊重，即便在新宪法下我也不认为改变了国体，天皇制依然继续存在。”

在“增田发言”中，只有钦定宪法（明治宪法）的感觉，对于明确为主权在民的和平宪法则完全没有认识。

第二是进行彻底的国防教育是有必要的。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继佐藤·约翰逊会谈之后，召开了全体阁僚和自民党干部恳谈会，就强化国防力量、国防教育的彻底性等进行了会谈。会后同记者会见的滩尾文相说：“把国民的国防意识禁忌化是不行的。在儿童时期就教育成有保卫国家

的思想是必要的。为此于一九七一年修改的小学学习指导纲要时，讨论国语，社会等学科，打算指示以某种形式把安全保障问题加进教材里。”

像这样滩尾的发言，早在一九六八年四月开始小学教科书内，由于“神话”的出现而开始收到“实效”。不过，像这样的神话教育从滩尾发言，开始看到了错误。像这样的神话教育、复古教育，早在岸内阁当时的一九五八年已经由道德教育复活开始了具体的步骤，由一九六六年中学教育审议会答辩中的“期待着的新人”、一九六七年七月文部省教育课程审议会“中间报告”（向社会科中加入神话）等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尽管如此，由于滩尾的发言更加快了这种复古教育的步伐，这是不容否定的。其证据是文部省在后来，对小学、中学、高中的教育课程，在大胆的进行“手术”的同时，于一九六九年使“大学管理运营法”强行通过，断然实行大学的政府统治。

“冲绳”以后来的人

佐藤内阁到一九六九年十一月执政满五年。如果这样继续下去，说不定会打破吉田内阁六年零两个月长寿内阁的记录，成为寿命最长的内阁。关于佐藤内阁长寿的理由，有人说：“因为没有强有力的竞争者”。这虽然说是很大的理由，不如说本质的理由是佐藤内阁按着美国和日本财界的意向制定的政策无大错误的贯彻执行了。从一九六四年池田内阁到佐藤内阁的接力赛中当时的“优胜候选人”中，虽有在国民中有人缘的故河野一郎，但财界对河野的“行动力”感到担心。“河野首相”不一定按财界的意志去做，美国也对河野氏的对苏友好姿态感到不安。就这样日本的财界首脑对在病床上的池田氏施加压力，使其指定佐藤氏为继承者。我

内阁寿命最长的十人

1969年11月

首 相	次 数	建 立	保持政权时间
1.吉田茂	2—5次	1948.10.15	6年2个月
2.佐藤荣作	1—2次	1964.11.9	5年
3.桂太郎	1次	1901.6.2	4年7个月
4.池田勇人	1—3次	1960.7.19	4年4个月
5.伊藤博文	(2次)	1902.8.8	4年1个月
6.岸信介	(1—2次)	1967.2.25	3年5个月
7.原 敬		1918.9.29	3年2个月
8.桂太郎	(2次)	1908.7.14	3年1个月
9.东条英机		1941.10.18	2年9个月
10.西园寺公望	(1次)	1906.1.7	2年6个月
10.大隈重信	(2次)	1914.3.16	2年6个月

注：保持政权时间是指内阁连续担任的时间，例如吉田内阁的第一次和第二次的中间，隔着片山、芦田两内阁，所以不包括第一次。

国的财界对于当首相既便是适合，但对财界来说感到有危险和不安的政治家出现时，尽管勉强也要弄个竟敌，要找出一个顺从财界的首相。一九六四年的政权交替时，财界对自民党的干涉，恰好证明了这个事实。

佐藤内阁经过五年时间虽对增强防卫力量、对美依附、推进防卫教育、强化大学管理等有“贡献”，但对至关重要的国民生活却置之不理。

佐藤内阁诞生当时倡导“社会开发”“步行者优先的政策”，好像是纠正池田内阁贯彻大企业优惠的经济成长政策。可是一九六五年提高了百分之六点六的消费物价，其后每年提高百分之四——五，一九六九年虽有“限制在百分之五以内”的公约，结果还是超过了。因此，国民生活由于物价的上涨而被逼入借款还债的困境，没有尝到“昭和元禄”①

①昭和元禄：元禄是指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以元禄时代(1688—1703年)为中心，前后约30年间，日本町人阶级勃兴，人民生活较为安定的时代。昭和元禄是昭和时代里较为安定的时代。

——译者注

的恩惠。岂止这些，还有交通灾害、产业公害、基地公害的苦恼，一九六九年度是历史上因交通事故死亡人数最高的年份。

佐藤内阁提倡用法律维护秩序，在一九六八年十月的新宿事件中，以适合于骚乱罪，镇压了反代代木派学生。可是，在这样佐藤内阁的统治下，于一九六六年八月田中彰治议员（自民党）因恫吓、欺诈而被逮捕等“黑雾”发生了，造成黑雾的根源，政治资金规则法的修改问题经过一九六七、一九六八、一九六九年三年都被束之高阁。

佐藤内阁勾销了国民日中友好的强烈愿望。佐藤内阁一边在口头上说“继承池田内阁以来的政经分离方针”，一边亲自访问台湾（一九六七年），支持中国最讨厌的“两个中国”的主张。LT贸易（日中综合贸易）也到一九六七年末的期限截止，由于民间人民的努力日中备忘录贸易无论如何也要改变这种状态。

由于国民的不安、掀起反对访美运动，于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七日，佐藤首相从首相官邸的庭院乘直升飞机直达羽田机场。逃避了反对访美游行才访问了美国。这样，在佐藤首相同尼克松总统的会谈中，开始宣传了一九七二年实现归还冲绳。可是，明确表示全面无条件归还冲绳的字句在佐藤、尼克松共同声明中根本没有。岂止如此，向冲绳输入核武器、美军在冲绳的作战行动自由均被承认，并使包括冲绳在内的日本本土核基地化。尤其，把归还冲绳作为交换条件一定是日本代替美国对东南亚各国进行援助。财界的一部分人把佐藤内阁的归还冲绳——代替援助东南亚，看成是“美意”，对大东亚共荣圈的重新开始而表示欢迎。可是，向日本本土输入核武器，“新大东亚共荣圈”所带来的是什么东

西不是很清楚了吗？我国人民“决心不许由于政府行为而再次发生战争的灾难”（宪法序言），遵照和平宪法的精神展开拥护宪法、反战和平的斗争是必要的。

2. 自民党的内幕

统治日本的自民党

报纸、电视、广播等新闻机关常用所谓“政府、自民党”的词句。引进英国议院内阁制的我国，在国会里占多数席位的政党在事实上掌握政府即行政机关的运营权。当然行政机关有时不能按执政党的意图行事。行政机关有时必须违反执政党的意图贯彻对国民正义与公平的原则。假如有时行政机关只按执政党的要求进行行政的运营时，由于在野党在国会控制多数也会使行政机关的运营权具有新的内容那会是什么样呢？当然，给行政运营的方针带来动摇，这种动摇所造成的混乱可能给主权者的国民带来麻烦，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不从属于执政党的统治即便是有“官僚主义”的意思对于行政机关来说也是必要的吧！

我国的现实怎么样呢？第二次大战结束之后的联合国军总司令部（美国政府和军队），除只有一年的“开明时期”外，一贯的支持保守党，从而刺激了在野党的发展。当时的在野党中，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是社会党，美国同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中国继续处于冷战状态下我国也不可能顺利的诞生社会主义政权。这样由于一九五二年讲和条约的生效，美国后退一步，代替美国势力的是由于朝鲜战争带来的经济景气，增强了实力的我国财界，出来支持保守党一直到今天。这样长时间的保守专政的结果，行政机关有长处的“官僚主义”也丢掉了，官僚在内阁的每次改造中，坠落成为从执政

党中出来的行政机关首长，即自民党议员随意摆布的棋子。在最近，官僚在积极领会执政党——自民党的意向，为实行自民党强调的各种政策而奔走。

在前面第1部分弄清了继续忽视宪法的战后政府的实态。战后政府忽视宪法也只能是继续支配战后政府的执政党——自民党讨厌、忽视这部宪法。自民党在今天成了随心所欲地指挥日本政治权力的“总司令部”。在这个意义上说，为了解战后日本政治情况、无论如何要解剖自民党及其一切就显得十分必要了。

自民党旗在悲鸣

自民党是在一九五五年十一月，由自由党、日本民主党两个保守党合并而诞生的。在党成立时以“党的性质”为题表决通过六项内容。这六项内容规定自民党的性质是：

- ① 国民政党；
- ② 和平主义政党；
- ③ 真正的民主主义政党；
- ④ 议会主义政党；
- ⑤ 进步的政党；
- ⑥ 谋求实现福利国家的政党。

这些项目都活用在自民党的文章上、自民党的纲领中。然而，今天的自民党果真能忠实的实行这六项精神吗？

首先是第一项所谓“国民政党”，通常意味着党生存的基础，在于广大国民群众之中。然而，若从自民党诞生来说就不是国民政党。

一九五五年十月，社会党的左右两派在“为实现日本的社会主义政权必须求大同存小异”的口号下实现联合，结成新的日本社会党。对此最受冲击的当然是财界。直到那时，

财界是利用自由党和日本民主党的对立，谋取增进自身的利益，而统一社会党的诞生构成了社会主义政权诞生的基础令人生畏。这时的财界首脑才不管三七二十一急急忙忙搞保守联合。在今日的自民党内同旧自由党有血缘关系的官僚派，同继承旧日本民主党血统的党人派的对立，是造成无休无止的派阀抗争的原因。这是本质不同的自由党和日本民主党嵌在保守党的一个框子里，使其胡乱联合的起因。

就这样，自民党特别是统治该党的佐藤派和财界之间，通过政治资金相勾结，正像下面所述是难以分离的。自民党从财界吸收了大量的称为政治献金的养分恬不知耻的活着。

证明自民党依靠财界有个恰当的插曲是自由民主党会馆的建设问题。东京千代田区永田町的自民党总部。在九层建筑的自由民主会馆——自民党总部前面，有一面在鲜红地上装饰有十四瓣菊花的党旗在飘扬。鲜红色象征前进和飞跃，菊花象征日本，据说有历史和传统的意义。那不管怎么说，自由民主党为建筑这个会馆以财团法人自由民主会馆的名义发行了十二亿日元的债券。把十五亿日元的总建筑费都让财界负担是不合适的。财界捐款只限制在三亿日元，之后以买债券接受过来。债券的年利率是百分之七点五。据说偿还期限为七年。大概同一流公司借债并驾齐驱。可是到底怎么样呢？第一次偿还期限是在一九六七年六月，偿还一亿七千万日元的债券支付九千万日元的利息，对一九六八年的偿还却不声不响装作不知。结果，认购了十二亿日元债券的各大企业好象把手中保存的债券捐赠给了自民党。在这里党徽的鲜红色所象征的前进和飞跃等都没有了，归根到底靠自己力量建设会馆是不可能的。

在一九六九年的大选中，据说财界也向自民党捐献了二

十到二十五亿日元。在一九六七年一月的大选中据说财界交给自民党的钱大约有十五亿日元，一九六八年七月的参议院选举中也达到了十二、三亿日元。此外如果包括自民党派系的领袖、议员个人收集的资金高达四、五倍之多。自民党如没有财界就不能进行选举。

露骨的财界压力

尽管如此，对于“利益”敏感的财界不见兔子是不撒鹰的。例如一九六九年末出现了汽车新税又被取消了，这是汽车行业的强大压力下，自民党作出的让步。汽车新税是对得到汽车者征收一定额的税金，想要把这些税款集中起来作为修新道路的财源，这是当时田中干事长考虑到的提案。无视日本道路事情的日产、丰田两大汽车制造商的汽车大量生产使交通事故、骚音，瓦斯排汽等发生了各种问题，“田中设想”在自民党内是个珍贵有利的理想。可是，汽车行业界人士说：“自民党忘记了平日的‘恩惠’，欺负汽车业界是怎么回事呢？”甚至把同盟系的汽车劳联（会长盐路一郎）拉出来对自民党露骨的施加压力。这样以来田中设想不知不觉地无影无踪了。尤其也有人认为田中设想本身是个“大花招”。为了收集一九六九年十二月的大选资金，自民党布置了田中设想，汽车业界拿出选举资金以撤回田中设想为交换条件，虽说这种说法是猜测也颇有真实性。

另外，关于公正交易委员会改组论，只能是政治权力私有化的说法。作为一九六九年后半年的经济新闻引起注目的是八幡和富士两制铁公司的合并问题，对于承认合并不高兴的公正贸易委员会，同年九月三日，自民党政策调查会（会长木村武雄是原行政管理厅长官）突然提出了公正贸易委员会改组论。其改组方案内容是：①把公正贸易委员长作为

国务相置于内阁的监督之下；②把公正贸易委员会的行政机能（在禁止垄断法的运用方面进行指导和监督）移交给经济企划厅和通产省，同司法机能（有关禁止垄断法的审查、起诉、审判业务）相分离，③在剩下的司法机能中，公正贸易委员会只限于有审查、起诉权，审判权移交给法院。

改组方案对面临着审查八幡、富士合并的公正贸易委员会施加心理压力的同时，目的在于取消长期以来担任消费者行政监督的公正贸易委员会的机能。改组方案后来落得什么结局不清楚了，虽然木村会长当初使用了夸张的说法：“不实现公正贸易委员会的改组将会使我国经济发展发生重大障碍”，可是到一九六九年十月末，上述两制铁公司实现了合并之后，行政调查会方案与“田中设想”同样的消声匿迹了。有个财界权威说：“在两制铁公司实现了合并的今天，公正贸易委员会的改组是不必要的。不然的话刺激国民是不好的”，因此，据说行政调查也把改组方案放弃了。

大米的减产也不能说与财界的压力没有关系。由于我国产业界劳动力不足而带来的人事费增加是个棘手的问题。从国民方面来说：“从前是用低工资来使用劳动力，因此提高工资是当然的”，这样给产业界带来的利润率的下降，无论如何也想要压低人事费成本。因此，财界根据所得政策固定工资，根据修改劳动基准法以强化劳动为目标的同时，就产生了从农村招收廉价劳动力的意图。在一九六九年剩余大米一百五十万吨的情况下，据说到一九七〇年秋剩余大米刚超过上一年的一半。这是产业界于一九六九年末同自民党商定使大米减产一百五十万吨以上，把农民从农村土地上逼走。当然，从仍然依赖大量的农民选票的自民党议员中出现了强烈反对大米的减产。尽管是这样，自民党干部敢于决心减产

的内情，应该看作是来自财界的相当大的压力。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即将大选之前，日本化纤协会、日本纺织协会等二十个纤维团体组成了“纤维产业联盟”，使其变成了政治团体。从自民党的“步调”来看，化纤团体给该党施加压力，目标是从政治上阻止对美纤维输出自主规定。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大选中财界发言人信越化学公司总经理小坂德三郎自立为候选人就是个象征。财界的一部分人通过政治资金不但间接地操纵自民党，而且出现了要亲自掌握政治的动向。

国民不在场的总裁选举

二年一度反复展开的自民党总裁选举是国民不在场的滑稽剧，同前面所说的“六项”性质即“国民政党”的形象相差太远。

战后二十几年，以财界为后盾连续保守独裁过程中，自民党总裁是当然的日本首相。首相一方面是独揽行政大权，另一方面能在事实上支配立法机关的运营，对众参两院议长也有自由衡量而选出的可能。最高法院的任免权也由首相掌握着。首相（总裁）还掌握着自民党的干事长、总务会长、政调会长等的选任权力，总之具有超乎想像以上的巨大权限。

当选自民党总裁的条件，限于该党所属的众、参两院议员，具有选举总裁权利的人是：①本党所属众、参两院议员，②每个都道府县的支部联合会被选出参加大会的代表议员（四人）之中，于大会五日前向党总部呈报后，被认定为有资格的一名代表。结果，历年来有总裁选举权的人只有四百五十人左右，其中除有四十六名地方代表议员外都由国会议员组成。总而言之，自民党是以国会议员为中心，不具有

国民基础，是为国会议员建立的头重脚轻的政党。

一九五五年保守联合以来，进行了九次总裁选举，一九七〇年十一月要进行第十次总裁选举。虽然说是选举，以前的选举展开了醜恶的斗争，其中以第二次（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四日），第七次（一九六四年七月十日）选举的情况尤为恶劣。

第二次总裁选举是伴随着原鸠山首相的引退进行的。虽然有岸信介、石桥湛山、石井光次郎三人为候选人，可是第一轮投票中谁也没有超过半数，于是又对第一的岸、第二位的石桥两人进行决选投票。这样以来由于石桥派同石井派组成了第二、第三位联合，石桥出乎意料地当选了总裁。理所当然，在总裁选举之前，岸、石桥、石井三派的收买，合纵联横作战是很激烈的。官僚职位的空头支票也乱开起来了，据说也有一个人预约了三个职位的。地方代表议员一到羽田机场各派就去劫持领到旅馆。三派共用金钱合计三亿日元。身为少数派的石桥派作了多数派的工作，因借款太多，石桥内阁组阁后进行的第一件事是返还借款工作。当然，除了以具体的金钱返还以外，以授予权利的形式进行返还也是不难想象的。

第七次总裁选举比第二次更为严重。故池田首相接受了佐藤荣作、藤山爱一郎两人的挑战，拼命抵抗。各派把金钱和政府、党的职位作为诱饵，使用“拖网拉渔法”“单钩钓”的方法。所谓拖网拉渔法是集中起来加以收买，单钩钓顾名思义即“一人一抓”。奸细横行，怪文件、谣言、传单泛滥，池田氏好歹第三次当选了总裁。当时各派用的钱达到了十几亿日元。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佐藤、三木、前尾三人竞选时，一边口喊“干净的选举”，该使用的钱也用了，也进行

了乱卖官僚职位的情况。这样以来被选出来的首相，尽管说是尊重法律和秩序，提倡“步行者优先的政治”（佐藤首相的公约），实际上是无能说服国民的。

仰赖核“恐怖”的和平主义

在前面谈到“党的性质”中，把自民党规定为和平主义、真正民主主义的政党。可是，可是从归还冲绳，日美安保条件的自动延长等自民党的态度来看，连一点和平主义、民主主义都没有。

自民党在一九六九年十月十四日把所谓“国民大多数”希望的日美安保条约的自动延长当作党的决议定下来了。可是，在自民党决定自动延长之际，并没有直接听取国民的呼声，当时报纸搞的舆论调查中，同安保的自动延长相比，分阶段的取消占多数。自民党决心自动延长作为最大理由是援引一九六八年三月原首相岸信介同美国前国务卿腊斯科的会谈。据说当时腊斯克要求：①在美国议会内谈论所谓“日美安保非双方承担义务”的呼声强烈，即便提出条约期限的修改也得不到承认；②长期固定化恐怕给日本国民带来反美情绪的高涨，因此，要求自动延长。自民党根据美国这种意向，对主张一九七〇年废除安保条约的革新势力只不过是“暂且回避”为目标下决心要自动延长。这样的自动延长事实上意味着日美安保体制的固定化。这在党的决议中也清楚的表明了“要经过相当长时期的继续维持”的做法。当时铃木总务会长也说：“所谓长期只少是在七〇年代必须坚持安保条约的意思，”（在北海道网走会见记者）。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在关于归还冲绳的日美共同声明中，在明确的“注视”着对日美两国利害有重大影响的朝鲜半岛的同时，佐藤首相在回国后会见记者时说：“对朝鲜半岛的

事态我们不能隔岸观火。也要在我国的宪法之下采取必要的行动。”韩国在美国支援下增强了军事力量，很有可能成为第二越南，一触即发的战争危险正在增大。对于这样的“火药库”，日本同美国同时许诺的事情，就成为日本自身的和平和安全的威胁。本来，一九七〇年六月二十二日自动延长的日美安保条约，在美国的核保护伞下要继续保持着“恐怖的和平”。同原来的维持和平条约差距太远。佐藤首相决心以归还冲绳的协约为交换条件，使安保条约的自动延长——在事实上长期固定化。

不过，自民党的自动延长方针恐怕也要受到国民的批判，该党为了坚持安保体制，从上到下，到处展开了不惜花钱的国民运动。

自民党首先于一九六九年九月十三日在银座的酒吧舞厅举行了称之为“安保谈话会”的讲演会。与其说召集不如说用日薪动员了六百多名女服务人员，从滑稽故事的三游事歌奴、说评书的一龙斋贞凤师等。让人听到“安保的关门论”。

以此为开端自民党展开活跃地坚持安保运动，在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五日，佐藤首相访美之前，在东京九段的日本武道馆召开了推进安保体制总奋起大会，召集了一万人。虽说是每人付给一千日元的日薪，对此自民党内也发出了不满呼声：“比起使用那么多白费的金钱，不如诉诸议员的后援会为中心的坚持安保的办法更好些”。（《每日新闻》）。总之自民党首脑坚持安保的信念是异乎寻常的。

治安对策是进步政党的工作吗？

自民党展开坚持安保体制运动的一个方面是指示警察当局对反安保势力进行严厉的镇压。特别是自民党请求对大学纠纷的对策，是调动一切机动力量进行解决，这是不变的治

安对策。

自民党担心“胡闹的大学”的将来吧！一九六七年来，滩尾文相发表了有名的“国防发言”即“禁忌国防意识是不行的”。以此为转机，从一九六八年四月开始在小学教课书里出现了“神话”，像前面提到的大力推进右倾化的意图。从一九六七年开始除小学外，在初中、高中的教科书中吸收国防问题是确实无疑的。

“日本是美丽的国家，富强的国家。世界上罕见的神的国家。”

一九四五年战争将要结束之前的“国民学校教课书”中刊载了这样的词句，充分考虑了将来复活的问题。更有的唱着“在自己家一边努力学习也能取得学士号，”的词句，广播大学设想经政府之手向前推进。唱的词句虽然满好，可是，推敲广播大学的具体设想的“广播大学问题恳谈会”（文部、邮政大臣的咨询机关），如从该会成员来看，就可以想像出广播大学的目标了。恳谈会会长是前经团联会长石坂泰三氏，委员中有原文部次官斋藤，国家公安委员坂西志保，日本兴业银行董事长中山素平，日本化药公司总经理原安三郎，国立教育研究所所长平冢益德，新日本制铁公司副总经理藤井丙午等，这个体制是名流一大排。政府、财界的意图是：“在一般大学里，与其接受反代代木派学生的影响相比较，不如通过家庭电视以技术为中心，进行对产业界有用的教育更好些，”使其按这个意图行动是无法掩盖的事实。

还有谈到自民党的“进步性体质”的有趣资料。

自民党每年搞一个《文化人名簿》。这个名簿是来自党的基层组织、地方支部的邀请讲演、选举的应援演说等为基础搞成资料，作为这种资料是一九六五年十月第一次搞成

的。可是，在一九六九年版《文化人名簿》中刊载的成员中有安西爱子、小汀利得氏以下一百四十一人。以“进步的政党”为已任的自民党选择的“进步的文化人”就是如此而已。

把谢礼金五万日元以上的七人排在表的最前头，以下三万日元者四十七人，两万日元者六十二人，一万日元以下者二十六人就这样规定等级。然而，自民党实际上选择的人物，大概离所说进步的感觉相差太远。例如田上穰治氏（一桥大学教授）。该人的宪法论被学者们指责为法西斯宪法论，强权的色彩较为浓厚，事实上也有在警察大学执教的经验。中保与作氏不用说谁都知道是韩国帮，大平善悟氏如果说是自民党文化人一定数他，他是讲演中苏对立论的鹰派学者。也有像神川彦松氏那样肆无忌惮地提倡歇斯底里改宪论的人。大井笃、富冈定俊（海军大学出身的军事评论家）、板垣直子（文艺评论家）等人都是战后人不了解的“旧学者们”。不过自民党在最近经常也用像高坂正尧氏（京都大学副教授）这样的青年，乍一看好像很懂理论的学者。因为用古董的文化人，国民也跟不上形势了。

即便这样，对高坂氏所代表的“现实主义者”，国民必须高度警惕。现实主义者注意到事物的固有状态，进行逻辑推理。缺乏要求应有姿态的陈情，结果只能根据现有统治体制方面制定出的政治、社会体制原则，承认这些原则了事。可是，体制方面为掌握自己的政治权力而要证明其正确性。任何有职衔的学者特别在今天都没有必要证明体制方面是正确的。敢于证明体制方面是正确的学者被称为“御用学者”也是不得已的。高坂氏以其著作《吉田宰相论》作为现实主义者确立了地位。可是，故吉田茂氏是以在现实中由连续六年零二个月掌握政权证明自己是正确的。本来学者、评论家都

是在野的，如因为是在野特别尊贵，那么赞美统治体制方面的学者只能叫做“御用学者”这种“蔑称”。以《吉田首相论》选择了吉田首相加以歌颂的高坂氏，被称为御用学者也是不得已的。大战结束以来已四分之一世纪。日本的反动化着着得逞，御用学者成了“食客”的事实，我们必须特别注意，加以警惕。

缺少清洁感的战后保守党

以上在“党的性质”中叙述了自民党的民主主义、和平主义、进步主义、国民政党等，都是明显地与事实相反的。在第六十一届通常国会（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一九六九年八月）中，使违反国民福利的“健康保险法案”，甚至在违反宪法手续的情况下强行通过，只从这个事实就看清了叫做议会主义、福利主义等用语的欺骗性。

可是，尽管“党的性质”也不明确，也有真正特征“性质”的一面，那就是“缺少清洁感”的性质。战后保守党的历史，仍然是腐败、贪污的历史，这样说毫不过分。

从占领时代起，围绕一九四八年煤矿国家管理的大贪污案件，涉及到了田中干事长。复兴金融公库融资时代的贪污案件中有昭和电工贪污案（一九四八年），在此案中牵连到了福田赳夫（当时大藏省局长）和民社党的西尾常任顾问等。

一九五四年在对保全经济会的不正融资事件中，涉及到了鸠山一郎、池田勇人等首相一级的保守党干部。池田首相能在政界出世，传说也是靠乱用职权的庇护。池田氏以大藏省东京地方国税局长这个流放之所仰望着未来。与故吉田茂氏在东京一高时代就是好友而且企图再建战后经团联的宫岛清次郎氏在庞大的财产处理问题中，池田氏得到了巨大的好处。在这个事件中，池田氏被宫岛氏大肆吹捧，被介绍到吉

田的足下。同样，以前曾经同池田氏争夺过总裁宝座的佐藤荣作现首相于一九五四年发生了造船贪污案件。不过，佐藤氏于同年四月二十日由犬养法务大臣发动指挥权而避免了逮捕。就这样，到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保守联合成立时，所谓大贪污案便突然不存在了。不！说“不存在”是不正确的。即便有也不能公布出来。为什么呢？室伏哲郎氏在其所著《战后贪污案》（渐出版社）中，说明了其理由。

据室伏氏说：保守党是复数的时候，为取得优势而互相一起揭对方的贪污案件。可是，保守党联合以后，即像今天的自民党这样，由一个保守党严密掌握检察、警察，因此，一切贪污、贪污嫌疑都在党内隐藏起来了。

像室伏氏这样分析可以说是有的放矢的。尤其是，不动摇自民党根基程度的贪污、丑闻等，所谓“黑雾”是频繁发生的。只简单的举几例就有：全购联贪污（一九五六年）、卖春贪污（一九五七年）、克拉曼·洛克希德事件（一九五八年）、东京站国铁会馆利权问题（一九五九年）、国铁志免煤矿出售处理事件（一九六〇年）、武州铁路贪污案（一九六一年）、光明池事件（一九六四年）等等。佐藤首相上台以后也有九头龙水库事件（一九六五年）、吹原产业事件（一九六五年）、共和制糖事件（一九六六年）、大阪出租汽车贪污事件（一九六七年）、日通事件（一九六八年）等连续发生。一九六五、一九六七年的防卫厅围绕筹办武器也发生了一连串事件，本来眼看着要发展成大贪污案件，因关系到佐藤派的人陷在旋涡中也就糊里糊涂的不了了之。此外，上林山防卫厅长官的衣锦还乡，松野农相的国外畅游，荒船运输相的急行停车等，包括乱用职权等一连串的“黑雾”事

件列举起来不胜枚举。

可是，必须注意阻挠自民党把权力私有化的重要因素在平静之中不断出现的事实。其典型是支持自民党有强大力量的地盘农村的造反现象。自民党推行拥护垄断资本政策，其结果，把农业置于次要的产业位置上、农村出现了破产。一九六九年在秋田、宫城、石川、长野、茨城、青森等产大米的地方，发生了农协青年自民党员的脱党事件，给自民党的未来投下暗淡的阴影。

3. 权力的主导者·佐藤派的政治资金

最不明朗的佐藤派

如果说自民党总部是权力的祠堂，那么左右自民党的核心派系——佐藤派，归根到底应该说是权力的神甫。那么这个权力的司祭者——佐藤派的生命活力是靠什么支撑着呢？一个是财界以及财界所带来的巨款政治资金；另一个是我国根深蒂固的强大官僚机构。这里解剖佐藤派的政治资金，就意味着揭开了日本保守党阴暗面。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佐藤先生！你张口便说政界必须干净，无非是说你率领的佐藤派。佐藤派的政治资金收支最不明朗的。在自民党的各派中，搜集政治资金最多的是你的派系，直到今天还是不明朗，到底是什么原因？……”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日午后在参议院予算委员会上，二院俱乐部的市川房枝氏这样逼问佐藤首相的。

据市川氏说，一九六七年自民党各派搜集的政治资金中：自民党的佐藤派是三亿七千七百八十四万日元，前尾派是二亿二千九百万日元，福田派是三亿一千七百四十七万日元，三木派是一亿六千一百八十万日元，越山会（田中角荣

自民党派系及其光明正大的程度统计表

【市川房枝调查】均为一九六八年中有一亿日元以上收入的派系。派系的顺序以收入金额排列，万元以下者四舍五入，收入总额和捐款金额是自治省发表的数字

派系	收入总额 (万日元)	捐款	捐款对收入 总额的%	透明度的 顺序
1. 前尾派 新财政研究会	84,358 "	9,650 "	28.01 "	8
2. 福田派 时局经济问题恳谈会 新政治经济研究会 千代田经济恳谈会	33,249 11,663 11,641 9,945	11,900 4,970 6,930 0	35.79 42.61 59.54 0	2
3. 佐藤派 政治经济研究会 育政会 亚细亚研究	29,825 11,680 9,685 8,460	550 0 100 450	1.84 0 1.03 5.82	5
4. 田中派 越山会	19,198 "	1,320 "	6.88 "	4
5. 三木田 政策恳谈会 近代化研究会	18,778 12,250 6,528	14,120 12,250 1,870	75.19 100 28.65	1
6. 藤山派 国际政治调查会 派系十一团体合计	16,290 " 54,696	0 " 37,540	0 " 24.75	6

后援会)是一亿二千零五十九万日元，石井派是一亿一千二百八十万日元(同自治省的呈报额相比稍有出入)。

可是，就这样搜集的钱多数成为会费收入。因此，谁通过什么办法搜集的钱是不清楚的，各派都担心害怕给“出资者”添麻烦，尽管把政治献金当做不需呈报的会费处理，回避了需要在政治资金规定法基础上，有公布义务的政治资金。

尽管如此，各派还是公布了一些政治献金，前尾派的收入中有八千零十万日元（占百分之三十四点八），福田派一亿七千六百万日元（占百分之五十五点四），三木派一亿六千一百八十万日元（金额），石井派是七千零二十万日元（占百分之六十二点二）。

可是，搜集了三亿七千七百八十四万日元的佐藤派只公布了三百万日元（占百分之零点八）的政治现金。因此，市川氏在弄清佐藤派巧妙的隐瞒自己派系政治资金来源的不明朗作法时，是这样监督和追究佐藤首相的。面对市川氏的质问佐藤首相也一瞬间畏缩不前的说：“没有那么回事，谁那样作（政治资金报告书）是谁要把他查清”佐藤低姿态躲躲闪闪。光是相信首相的这个答辞，那就是说佐藤首相不知道关于本派系政治资金情况，这很明显地是真正的谎言。不管佐藤首相知道不知道这个实际情况，佐藤派的政治资金收支不明朗不说也是当然存在的事实。

首相的忙碌

在了解佐藤的政治资金的秘密之前，必须对佐藤派的本身进行解剖。一般的说“自民党有十三个师团”。对于政党来说，派系就象离不开的附属物，因为自民党内有佐藤、前尾、福田、三木、中曾根、藤山、园田、松村、石井、村上、船田、川岛、石田等十三个派系。在这里派系势力最大的不用说是佐藤派，该派在众议院有六十一人，在参议院有四十九人，合计拥有一百一十人，其次是前尾派（众参两院合计六十四人），佐藤派把前尾派远远抛在后面（一九七〇年二月一日的统计）。

故大野伴睦氏（原自民党副总裁）有句名言说：“自民党派系的最大规模是五十人”。这句话在今天大体上还是真

理。自民党的派系一超过五十人，政治资金和人事分配都不好处理，结果，由于内部发生裂痕而结束派系。膨胀到一百人的佐藤派也不例外。佐藤派现在也不断分化成“鹰派”的保利系（官房长官）和“鸽派”的田中系（干事长），这两个流派成为今后占卜自民党的万能钥匙。以上是佐藤派的概况。

虽然市川氏追究了“佐藤派的政治资金是不明朗的”，但佐藤派的不明朗并不是从今天开始的。一九六七年九月，自治省发表了一九六七年上半期（一月——六月）政治资金收支报告书的内容，在这里佐藤派把大部分的资金收入作为会费收入隐瞒了出资者处理了，在一九六八年的政治资金收入报告中，也只公布了五百五十万日元的赠款收入（占整个收入的百分之一点八四）。

那么向佐藤派支出巨额外会费的公司、团体的都是哪些单位呢？向自治省呈报的佐藤派的政治资金报告书指的哪些单位当然知道了。可是，谁把钱送给了佐藤派？至少能推测到赠款的“主人”这方面的资料。这如果看看午后六时以后佐藤的活动便知分晓了。一天工作完了的佐藤首相，只要不去轻井泽·镰仓休养的情况下，那就频繁地出入于柳桥、赤坂、新桥的饭馆。在其前后有警视厅的侦察队跟随，有时不顾红信号的横冲直撞真不得了。佐藤首相来往于赤坂、新桥也许是为了解公务。那么，去赤坂、新桥的目的是什么？那是为了出席围看佐藤首相打转转的各种聚会。佐藤首相出席的主要聚会有十九种。假设这样的聚会每个月有一次的話，除去静养的日子，佐藤首相差不多三天之中有两次，这些聚会是必须出席的，因此佐藤首相的忙碌程度是可想而知的。

当然，这些聚会中，虽有像佐藤母校五高的OB会这样

以亲睦为主的集会，可是大多数聚会是与佐藤派搜集资金有关。完全是佐藤派财界人聚会的是长荣会。聚集在这里的成员像新日铁总经理稻山嘉宽、富士银行董事长岩佐凯实等，每年给自民党乃至该党的政治资金集团——国民协会以巨额政治献金，都是大垄断资本中的大人物。长荣会因给搜集资金，当然要对佐藤内阁重要政策的决定提出各种意见。而因被评论为“夜晚的阁议”的理由就在这里。

佐藤首相还组织包括各行业、各地区的聚会，例如十八日会是日本银行政策委员新关、前三井银行董事长佐藤等三井系首脑的集会；吉兆会有日立造船董事长松原、住友银行董事长堀田庄三、关西电力公司总经理芦原义重、松下电气公司董事长松下幸之助等关西财界首脑人物的聚会。佐藤首相把这些聚会的具体运营委托给保利茂、爱知揆一、桥本登美三郎、田中角荣、西村直己等佐藤首相的“左膀右臂重臣们”，这些“臣下”也就拼命干着抓钱的事情。

佐藤周围主要聚会名簿

长荣会：

新日铁总经理稻山嘉宽，日本精工总经理今里广记，新日铁董事长永野重雄，富士银行董事长岩佐凯实，东京电力总经理木川田一隆及其他财界主流和佐藤派议员干部田中角荣、保利茂、爱知揆一等

黎明会：

财界的稻山、今里、木川田等；时事通信社社长长谷川才次，评论家木内信胤等新闻界人士；仓石忠雄，石田博英、福永健司，藤枝泉介等议员，原藏相的泉山三六干事

心游会：

丸善总经理司忠，正田酱油董事长正田文右卫门等商工界人

士和参议院议员井野碩哉等人组成的团体。

三水会：

阿拉伯石油公司总经理小林中，日清纺董事长樱田武，前产经新闻董事长水野成夫等财界首脑和岸信介，川岛正次郎，福田越夫等政界实力人物。

五日会：

小林、樱田、稻山、永野、水野等财界主流集团。

十九日会：

日银政策委员新关八州太郎，前三井银行董事长佐藤喜一郎等三井集团干部。

月一会：

帝国石油总经理林一夫、日立金属总经理中村隆一、东急专务松田令辅、四国电力董事长中川以良等山口县出身的财界人物集团。

铁道例会：

国铁总裁矶崎嶺，东北开发总裁小仓俊夫等运输界人士和细田吉藏等议员们。

十一日会：

以政界往来社社长木舍几三郎为中心，有川岛、福田、爱知、椎名悦三郎、赤诚忠德等议员；

二木会：

前产经新闻专务土屋清，日本经济新闻社长园城寺次郎，评论家福良俊之，木内等经济问题智囊集团。

吉兆会：

日立造船董事长松原与三松、住友银行董事长堀田庄三、关西电力总经理芦原义重，松下电气产业董事长松下幸之助等关西财界集团。

海鸥会

伊藤忠董事越后正之，东洋棉花专务安本和夫，三井物产常务瀨下英治等财界人士和石井光次郎、前尾繁三郎、中曾根康弘、大平正芳、水田三喜男等政界实力者集团。

二十四日会：

岸、川岛、福田、赤诚、木舍等财政界，新闻界混成集团。

二十九日会：

岸、福田、川岛、三木、松浦周太郎、木舍的团体。

二十二日会：

矢次一夫，细川隆元、唐岛基智三、御手洗辰雄、小汀利得、木内信胤等评论家集团和福田、田中龙夫等岸·福田系政界人士。

八日会：

岸、福田、川岛、椎名、坊秀男、小川半次、森下国雄等岸福田系为主力政界集团。

五高OB会：

细川、经团联事务局长堀越楨三、法相小林武治、国务相荒木万寿夫寿多人。

日本会：

前资生堂总经理森治树，小田急总经理安藤梢六，日大董事长古田重二良，作家三角宽等文化、艺术、工商人士为多数和贺屋兴宣，西村直己，桥本登美三郎等。

山水会

前三井银行董事长佐藤、原电发总裁藤井、田中龙夫、有田喜一等福田派议员集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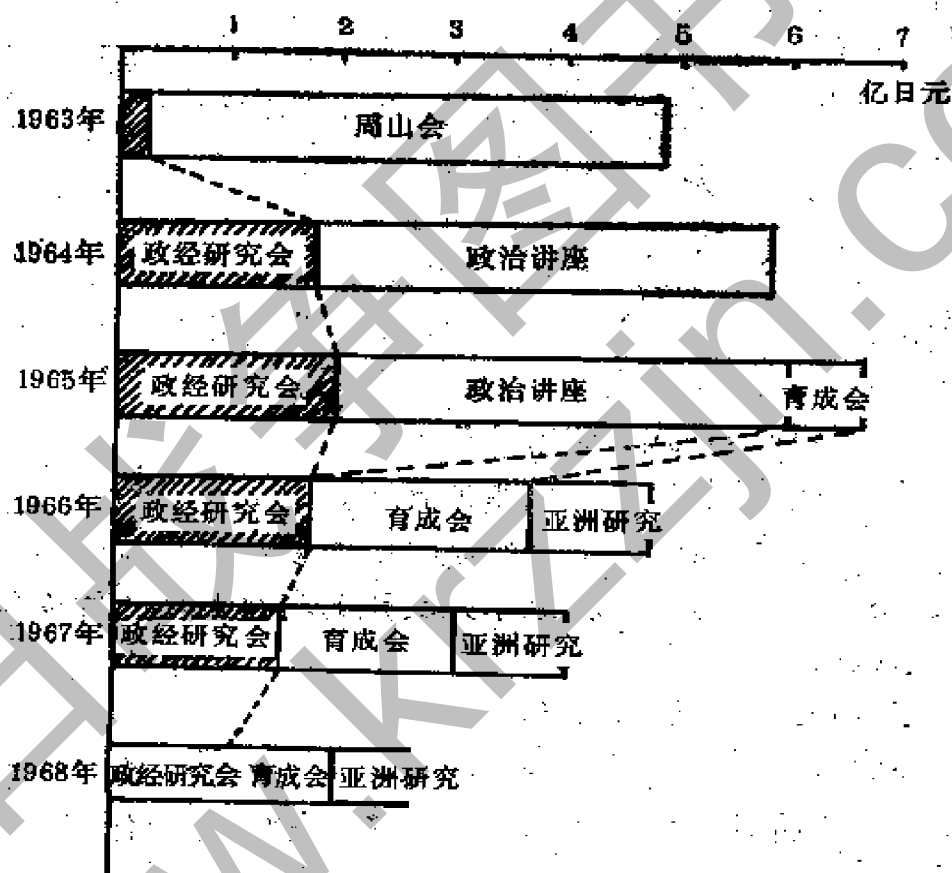
巧妙隐蔽的“进入口”

“时隐时现的佐藤派啊！政治团体可真奇怪啊！”

每年的政治资金收支报告提交到自治省手里，由该省选举部长加以分类、整理。可是，曾有个选举部长，一边看佐藤派的报告书，一边对新闻记者哼着上面的“歌儿”。

这个话的真假程度虽然可疑，但对佐藤派不明朗的政治团体一语道破这一点实在有趣。佐藤派不仅要隐瞒从何处领取了多少资金，而且须取钱的佐藤派政治团体连手法也不断变换来隐瞒纳钱的“渠道”。

图4 佐藤派派系资金收入的变迁



如果谈到一九六三年有三木武夫、滩尾弘吉各氏关于党近代化、组织化然后解散派系的报告书、建议统一的时候，自民党内出现过解散派系的热情。乘着这股热劲各派相继解散了“表面上的派系”，佐藤派也在一九六三年未解散了在那

之前已成为佐藤派“资金筹措本部”的“周山会俱乐部”。这虽然很好但以后又不行了。到一九六四年，又设立了“政治讲座”的团体，于一九六五年筹集了四亿六千四百二十万日元的资金，实际上是继承了周山会所从事的筹集资金的工作。可是，这个“政治讲座”到一九六六年只筹措一千三百万日元，于同年二月解散。

可是，正像予料的“政治讲座”解散那样，于一九六五年组成了“育成会”，一九六六年七月组成了“亚细亚研究”等组织，筹集了二亿日元以上的钱。这就是上面那位部长的“歌儿”中所说的“时隐时现的佐藤派……”

诚然，有计划的组织一个政治团体在二、三年内加以解散的作法，即使是自治省、国税厅这样专门的官厅来追究其政治资金的去向行踪也是很困难的。像这样隐蔽渠道的办法是佐藤派的目标。佐藤首相的“左膀右臂大臣们”绞尽脑汁想出的办法，迄今为止充分发挥了效果。

“这是佐藤方式的绝着！”

什么呀！硬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

这是一九六六年“黑雾”骚动的时候，刊载在一个报纸的投稿栏里的优秀作品。这不是真正的名符其实的作品的著名故事吗？

反映政局的“特务机关”

佐藤曾有有三个政治资金集团。即育成会、政经研究会、亚细亚研究。那么这三个团体都具体的发挥什么作用呢？关于这三个团体发挥机能的目的，佐藤派的干部坚持守口如瓶。可是，在消息灵通人士中间，认为“育成会”是佐藤派经常费用筹措团体，“政经研究会”“亚细亚研究”是两个特务机关，这种说法已成定论。所说的特务机关是以维

持、强化和扩大派系为目的的机关，具体的说是以破坏其他派系为最大目的。

例如，“政经研究会”于一九六四年七月的总裁选举前就开始很快筹集了大量资金，在组织方面到处花钱，这次选举被称为“历史上最大的实力战”。一九六四年上半年以“研究费”名义领钱的议员有桥本登美三郎、佐野广、冢原俊郎、瀬户山三男、木村俊夫、竹下登、渡边良夫名氏。多者领了一千八百万日元，少者也领了三十万日元。一看这些议员的阵容，都是佐藤派的中坚干部，作为拉拢其他派的主要干部是最合适的了。

就这样“政经研究会”在一九六五年筹集和消费了超过两亿日元的资金。如果说一九六五年只是诞生了佐藤总裁，还没有确立佐藤的基础。当时，佐藤派离间旧大野派、旧池田派两派的活动还未进行，只是企图分割和削弱“池田遗留体制”。可是到了一九六七年一看政治资金收支报告书，“亚细亚研究”的扩张是引人注目的。这是应该看作是为一九六八年十一月末自民党总裁选举以“亚洲研究”为基轴而进行的政治工作？在一九七〇年十一月的总裁选举中，“政经研究会”“亚细亚研究”是如何活动必须加以注意。

自民党这个巨大的“老政党”与社会党同样，虽然被民社、公明、共产等各少数政党逐渐逼的走投无路，但佐藤派的政治资金集团顺应政局经常变得活跃，保持生命力。虽然自民党衰落了，但佐藤派却能想办法不会那么简单的死掉。

连买绘画也得派系付款

那么以“育成会”为中心筹集的“经常费”是如何使用呢？看看育成会政治资金收入最多、开支最阔绰的一九六六年下半期（六月——十二月）吧！

一九六六年收入一亿八千四百四十四万五千日元，其中，下半期的支出是一亿二百七十一万七千零一十五日元。接近全年收入的百分之六十是下半期支出了。而且，下半期支出的一半以上即五千三百六十万日元以“调查费”的名义给了冢原总务长官（当时）、木村官房长官（当时）。“调查费”调查什么呢？一般人是不知道的。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八日给冢原氏等九人各三百万日元，同年十二月十日又给田中角荣等七人各三百万日元的“调查费”。前者三百万日元显然是“中元节赠礼”，后者三百万日元是“粘羔钱”。当时前尾派的中元节赠礼和粘羔钱各二百万日元左右，对派系“忠诚程度”差的只给五十万日元。由此看来，终究是占有“政权宝座”的佐藤派的津贴多。此外，在中元和年末期以“组织活动费”的名义给干部数人以二百万日元的“特别配给”。没有什么事情，佐藤派干部以调查费、组织活动费的名义每年五百万日元“明晃晃”地落入了自己的腰包。

会议费、接待交际费花费的情况也是相当阔气的。会议费半年之间十三次共一百二十六万日元，一次大约十万元，会场几乎都是在G饭店。接待交际费虽然只有三百万日元，一次就使用了近四十万日元（八月二日），一天之内在赤坂、筑地、柳桥各撒出去也有二十几万日元。

可见，佐藤派比谁都狡猾，隐蔽的最巧妙。支付接待交际费时，先不写某某饭店、某某饭馆等、只写饭馆之类饭店代表者姓名，在这里，就是让专家来看也看不明白是在哪进行的“交际”。看到一九六七年下半期的“交际次数”是：七月九次，八月六次，九月四次，十月十次，十一月五次，十二月六次等，如果平均的话，每五天就举行一次宴会。这

应该有多么令人羡慕啊！假设自民党十三个师团都同佐藤派一样在饭店开宴会的话，一年落入饭店的钱轻而易举的就会超过七千万日元。对于赤坂、筑地、柳桥的饭馆来说，“自民党先生”是多么好的顾主啊！

此外还对企业界报纸、杂志等以广告费、赞助费的名义付给四百二十八万七千日元，不能忘记登登一些“吹喇叭抬轿子的记事”，总之，也有只靠佐藤过活的新闻社。

出人意料的暴露了佐藤派的浪费的是政治讲座（一九六四年上半年）于一九六四年五月二十日支出的“绘画款”三十万日元，绘画的作者是什么原来的藏相议员泉山三六。泉山氏那么“手艺高明的画家”恐怕佐藤派的侍从人员不是不知道吗？

最近时期佐藤派的政治资金收支报告不像一九六五年前后那样具体。佐藤派带着深刻反省的样子：“以前的报告书，过于“正直”，没想到引起了误解（？）”，乍一看好像提出很有道理的报告书。因此，尽管是把最近的佐藤派的报告书给自治省看，佐藤派的欺骗也不那么显眼。可以说佐藤派的报告书从来就是恶劣的。原因是佐藤派政治资金的开销一旦使用，没有向明朗方向转化的证据。

总之，从国民方面来看，佐藤派政治资金团体是个骇人听闻的巨大的资金导入机关，同时可以说是巨大的不明朗的浪费机关。

没有进展的资金规则

像这样不明朗的政治资金的状况，国民舆论给予严厉批判，首相的咨询机关的选举制度审议会以前也对政府提出了个什么关于政治资金规则的咨询答案。那么，这个咨询答案是怎么处理的呢？

一九六一年池田内阁当时成立的第一次选举制度审议会（会长野村秀雄民），在对高级公务员限制主办候选人，强化连座制的同时，关于政治资金规则谈了下列意见。

“公司、工会对于选举或政治活动应该禁止赠款，只是实行的时期要继续进行研究，首先采取下列措施。①国家或地方公共团体、公共企业团体以及伴有其他特别利益的契约当事者，除了选举以外的政治活动不能给捐款。②从国家或地方公共团体接受补助金、奖励金、资助金、负担金以及其他按这样标准交付金或出资金的公司及其他法人，以及从国家直接接受利息补助金的公司及其他法人，对于选举或政治活动均不能捐款。”

对此，政府作为“在政治活动中是需要花钱的机构”，在无限制捐款用于政治活动的同时，以“添加收据支捂搪塞”。

在第二次选举制度审议会（会长阿部真之助）中，①捐款限于给个人；②设置筹积资金的机关，承认为个人筹积资金从中加以协助。③个人捐款金额目前不加限制。④实行期间被形成法律条文以后延期一年——回答了这样的质询之后，政府仍然置之不理。

只讲口头的首相

再也没有像在佐藤内阁之下，成立的第五次选举制度审议会那样，把政府、自民党的虚伪暴露于天下。

以共和制糖不正融资事件为开端的一连串“黑雾”事件之前，佐藤首相于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七日被迫建立了第五次审议会。可是在同时召开的审议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首相的致辞真是动听呀，首相说：“对于政治状况来从各方面的批评，我痛感责任的重大。今天，引起这样事件的原因，首先

我想是在选举中花钱的问题。在此答辩质询之际，尊重大家的意见，并想为果断地实行而努力。”

因此，这次审议会进行了紧急政治资金规则的审议，一九六七年五月进行了如下质询的回答：①对于政治团体个人的捐款，一年间一千万日元，公司的捐款一年之内不超过二千万日元；②党费、会费之中，法人和其他团体负担的以及捐款以外的收入，不管是以赞助费，维持费以及其他任何名称，都应被看做是对政治团体在资金上的援助。

可是，看到了这个答弁的政府自民党认为“这样的答弁根本不能实行”，早在同年六月就着手把这个答弁的主要内容抽掉而加以法制化。在野党对此反映强烈。其中社会党的岛上善五郎氏（当时是该党选举制度特别委员长）于六月八日在众院全体会议上追问说：“政府、自民党在抽掉了答弁的核心内容的基础上，达到使法案流产的目的”。对此佐藤首相回答说：“政府十分重视答弁考虑维持原案。因为要在下星期内提出方案，请多多关照。决不抽掉一点主要内容。”

可是，隐瞒什么呢？佐藤首相答弁几小时后，经同是佐藤派的松野赖三氏（当时的自民党选举制度特别委员长）之手，编造出了完全忽视回答质询的政治资金规则法修正案。就这样，于一九六七年在通常国会上被提出来的政治资金规则法修正案，正像佐藤首相，松野赖三氏等人的预料那样遇到了在野党的反对，巧妙而又“幸运的”流产了。

对于佐藤首相这样的态度，就连“御用委员”和招致在野党严厉批评的审议会委员们也产生强烈反应。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七日虽然把佐藤首相叫到全体会议上进行了追究，佐藤首相却毫不在意的回答说：“我也痛感有责任，遵照回答质询的“宗旨”搞成的修正法案虽然提交给了国会，未能审

查完毕，实在遗憾。”尽管政府案是同质询距离很远的方案，但首相以尊重审议会回答质询的政府方案正好由于在野党的反对而代替了自己要取消政府方案的本意。

其后，七月廿九日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首相说：“修正案未能审议完了真是遗憾。可是，我作为总理、总裁具有诚心诚意，我想有良心的国民都是清楚的。”听到这番话，不仅是在野党，就是在自民党席上也哑然失笑。

一到一九六八年，佐藤首相随便作了自我批评说：“不考虑在国会能成立的方案，过分的追求理想（？）”（在二月二十四日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同年五月一日又制成了称之为“现实的”政府方案。根据此案就成了这样的体制，例如：东京电力公司能捐献二亿七百万日元，八幡制铁能捐献一亿八千万日元完全取消了审议会回答质询中规定的最高点二千万日元。在通常国会进入自然体会的前十天把这项法案提交给国会是没有道理的。

一九六九年六月又提出了同一九六八年内内容完全相同的法案，而是趁着在国会上，大学、健保法案成了废案的时候提出来的。就这样这个时间也“顺利的”流产了。国民虽然强烈希望这个法案被强行通过，但自民党对政治资金规则法修正案却像过继子那样虐待。

那么，政府、自民党为什么这么憎恶政治资金规则呢？不用说是因为首相、自民党总裁的佐藤荣作氏率领的佐藤派由于强化政治资金规则成为最大的受害者。财界希望政治工作资金在政党内部隐蔽的流动。在那里，为了确保资金的输入，把佐藤派同财界连结起来的政治资金渠道，永远用遮掩物掩盖起来是必要的。

见机行事的财界

1968年捐款2千万日元以上的法人主要领先单位

捐款法人	捐款总额	接受捐款的主要团体
国民协会	3,923	自民党
公明党	244	公昭协会
民主社会协会	161	民社党
东京银行协会	120	国民协会
日本钢铁连盟	114	"
电气事业研究会	100	"
日本汽车协会	81	"
总评政治活动委员会	77	社会党
三友调查会(三井集团)	66	新政治经济研究会, 政策恳谈会 新财政研究会, 三卷秋子研究会
日本教职员工会	55	日本民主教育政治联盟
石油联盟	50	国民协会
新政治研究会	43	昭和俱乐部
日本化学纤维协会	36	国民协会
全国地方银行协会杂志	35	"
日本瓦斯协会	35	"
东证正会员协会	34	甲辰会, 新政治研究会, 政策恳谈会
西政会	34	自民党、社会党, 新政治经济研究会 新财政研究会
盐崎与吉	30	新财政研究会
水泥协会	30	国民协会
京阪电气铁道会社	28	国民协会, 道德昂扬联盟
北友调查会	27	第一国政调查会, 甲辰会
全日本海员工会	26	全日本海员工会政治活动委员会、民 社党
生命保险协会	26	国民协会
大林组株式会社	26	林道会(藤田义光氏)
政策恳谈会	26	近代化研究会
日本证券协会联合会	25	国民协会
日本损害保险协会	21	"

单位: 百万日元

当然，每年奉送不明朗的政治资金的财界方面的责任也应该追究。一九六六年年末，国会由于产业界的政治献金所带来的各种黑雾而解散了。由于黑雾使国会陷于剧烈颠波摇晃的一九六六年八、九月，财界首脑都异口同声的反省了他们的政治资金给政界带来了什么样地“罪恶的种子”？可是结果怎么样啊，国会于同年十二月一解散，十二月二十七日早晨，财界实力人物七十人在东京丸之内大娱乐场饭店集会，经过协商的结果，把筹集给自民党的选举资金由一九六三年开始增加到五亿日元到二十亿日元。

这时激怒了由主妇联、日青协等九个团体组成的选举法修正运动协议会，向当时经团联植村副会长提出了抗议。可是，植村却回答说：“本来选举是需要很多资金的。如果财界不送钱的话，反而有可能筹集带有条件的资金。”当然，给钱之际，财界方面提出要求：①解散派系；②严格选择候选人；③实行光明正大的选举。然而，这些条件只不过是形式，从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九日进行的腐败选举中可以得到证明。

像这样地财界不附带条件的捐款是没有的。一九六七年一月的选举之后，立即开始了一九六八年度的预算编制。在这个过程中大藏省也受到国民舆论的压力，想要把银行存款利息分离课税税率从百分之十提高到百分之十五。可是由于在选举中援助过自民党的银行方面，立即向自民党首脑施加压力，结果自民党首脑也不顾本党青年议员的反对，谋图把提高的税率推迟三年。

银行的压力不只是这些。决定税率提高推迟三年，银行界对大藏省、自民党施加更大的压力，目的是降低邮政存款的利率。银行一年定期存款利率比一年到一年半的定期邮政

存款的利率低百分之零点零七五，因此银行方面要确保银行存款而要求降低邮政存款的利率。舆论界对此强烈反对，因此，大藏省、自民党也一时感到进退两难。

在银行方要求降低邮政存款利率不成的情况下，又进行新的讨价，推动小额存款的所得非课税制度的放宽和减价债的泉源课税等，满足了其大部分要求。这些虽然是个别的例子，但却是说明政治资金产生“利益”的典型事例。总之，财界为将来的难处着想，为实现特定的目的而捐献多额的政治现金。其政治资金毒害政界，助长了腐败选举，这对财界来说是不太清楚的。

首相自己不正常地申报

此外，宽恕政治家偷漏税的税务当局也是问题。例如：佐藤首相一九六六占年度的所得申报只有六百三十四万九千四百八十一日元，首相的年薪是六百一十六万日元，年薪之外的收入只有十八万日元。根据申报这十八万元全部是电台电视演出费。根据这个申报把所得税地方税等二百七十万日元扣除，则首相每月只有三十万日元的收入。因此，出入神奈川县的茅崎市斯利汉德莱特俱乐部（高级高尔夫球场）、在镰仓、轻井泽的别墅进行周末静养都不可能了。在这种情况下，佐藤首相也认为是“不正常申报”而后追加了一百二十一万日元的申报。一九六八年首相的所得申报虽然增至一千三百四十二万日元，扣除这里的年薪一千零三十一万日元，其他杂收入占不过是三十二万日元。这是无法理解的申报。总之，对待平民极为严厉的税务署，一遇到了政治家就显得极为温顺老实了。

仍然是金钱起了作用

一九六四年七月十日，在东京文京公会堂召开的第十四

次自民党临时党大会上，进行了史无前例的腐败选举。这时佐藤、藤山两人向要第三次当选总裁的故池田首相挑战。特别是佐藤、藤山两人同岸信介等结成了新的顾问会，自民党内趋于两极化。

处于其间的中间派大野、河野、三木、石井等各派变成了池田和佐藤、藤山两大阵营的割草场，甚至出现了从池田、佐藤、藤山三派领钱的“三方取议员”。平均收买一名议员花五百万日元，其中听说有的得到两千万日元，可见其腐败程度极为严重。有所谓“单钩钩”的各个击破战术，有所谓“撒大网”的集团击破战术，有所谓“奸细”的派系骚扰者在暗中活动。总之。加入一个派系一个派系，最大限度的高喊“支持某某”，一到要投票的时候，甚至出现了“秘密奸细”把同志彻底拉过来投反对派的票。因此，自民党议员使人有“邻人皆密探”的不信任感。

那么看到了一九六八年十一月总裁选举是怎么搞的？就可以占卜一九七〇年十一月的总裁选举的情况，可以看成是一次重复。

围绕一九六八年十一月总裁选举的前哨战是由九月四日前尾、三木两派干部会合而正式开始了，前尾和三木两派的会合引起了五日的三木和中曾根两派，前尾和中曾根两派干部的会谈，六日的藤山和中曾根会谈，着了慌的佐藤派也于六日在新大谷饭店开会，开始分析了各派的动向。尽管佐藤派宣传了“九月中政治停战”，又慌忙集合，因此，该派被反主流派和非主派所冲击了。

就是在佐藤派内部，当时也有保利建设相、田中原干事长二人说：“佐藤三次当选决不是那么简单的”，告诫说要及早“采取必要对策”。这两个人的告诫逐渐渗透到佐藤派

内部了吧。“前尾派的A接受了佐藤派B的强力引诱”“三木派的原自治相C好像有接近于佐藤派的活动”“旧大野派的D好像已经被佐藤派的实弹射中”——诸如这样的说法频繁地流传着。在这些“人物动向”的背景中，有着金钱和充当阁僚、党的干部职位的密约。

另一方面，当时的各派领袖，为了总裁选举一心一意地弄钱。其中对于下一期主力战斗机Fx的输入问题，主流派与反主流派、非主流派的动向是极不明朗的。Fx主力战斗机是因为现在用的主力战斗机F104J（洛克希德公司）在第三次防卫力量整備五年计划（1967年度——1971年度）的末期由于损耗短缺，而代之以引入的战斗机。F104引入之际，有所谓“是洛克希德还是古拉曼”之争，进行了“一千亿日元的空中战”，政界各派都拼命参加了接受订货的混战。

Fx的预备飞机中，CL1010（洛克希德公司——丸江饭田公司）、F4E凡托姆（玛克丹奈尔公司——日商）被提出来了。反主流派、非主流派主张用CL1010，佐藤主流派主张用F4E凡托姆飞机，如同预料一样，最后还是佐藤派主张用F4E定为军备飞机。

尽管Fx的购入总额只有二千亿日元，也有百分之十的二百亿日元的赚头。如有百分之十的赚头对于开展总裁选举很有利，因此各派为Fx的制造公司、贩卖公司拼命的活动是可以理解的。在F4E决定之前，首相同日商干部密秘会谈，据说同席参加会谈的还有佐藤派的原防卫厅长官松野。

这里不可理解的只是川岛副总裁。川岛氏担心“这样会成为空前腐败的选举”，他于一九六八年八月末同佐藤首相会晤，说道：“希望实现不用钱的光明正大的选举。”可是就是对于这位川岛，反主流派有个干部指责说：“川岛很

狡滑，川岛现在采取中立的立场，回避十一月分佐藤派同非主流派、反主流派的决选，暂且先举党一致实现佐藤三次当选。然后，把巨额选举资金不用于佐藤派而作为“礼物”把一部分钱从佐藤那里据为己有。”

尽管总裁决选未能避免，由于“策士”川岛氏的工作，使佐藤总裁得以战胜竞争者三木武夫，前尾繁三郎。不是还有那种事情吗？总裁选举刚结束，川岛氏也顺利留任副总裁。同时进行的内阁改造中，川岛派的长谷川四郎担任了农相这重要职务。尤其是一九六九年七月，该派的大干部藤枝泉介当了众议院副议长等，川岛派遇到了破格的优待。川岛派的目标是“万年第二号”。像三木、前尾派那样得不到第一号职务，宁愿被他们利用来发挥自己的作用。当然，在川岛氏每当被利用时不用说要得到一笔意外的收入。从现在自民党各派的人数来看，只靠自己派内人数想要夺得总裁的职务是比较困难的。这意味着对于以调节几个派系求生存川岛氏。各派的“需要”在短时间内不能想像会很快消失的。

总而言之，自民党内是具有超乎想像的复杂。

政治资金现代化是当务之急

美国同我国一样，虽然有关于政治资金规则的法律，但比我国更是无法无天，一到总统选举时大捆条子横飞。从一九六四年总统选举到一九六七年夏天，据说民主党花钱两千万美元。因此，制定了总统选举运动基金法，要实现总统选举“公营”。只是批判该法“过于革命”是否有实效值得怀疑。

英国的乔治三世时期（一七六〇年——一八二〇年）曾有腐败选举的横行，当选了的议员为出钱的君主、企业家、地主服务。因此，据说一七八九年完成了革命的法国不采用

英国的议会制度，而创造了自己的政治制度。可是，英国根据一八八三年的法律整顿了腐败的选举，今天的保守党、工党两党的选举靠大多数党员缴纳的党费来维持。据说西德、法国、意大利等国的政治资金制度整顿选举可以说都是相当彻底的。如果说政治资金制度同样放任自流的那就是我国和美国。佐藤首相如从内心愿意使自民党现代化和组织化，首先应该把佐藤派的政治资金筹集的形态现代化、公开化。

4. 指挥自民党的财界

积极发言的财界

在保守政党的背后有财界支撑的事实是已经很清楚。因为自民党需要筹集政治资金，必须以财界为助力。财界也为扩大自己的权利，有必要享受居于权力宝座上的自民党带来的各种利益。这样的财界害怕同自民党的勾结公开化，竭力抑制政治发言。财界的政治要求和政治方针，给自民党议员施加压力，使其发言，如能使其实现，财界则可满足。然而，到一九六八年，一九六九年，归还冲绳问题，作为正式的政治问题进行讨论时，财界却进行了空前活跃的政治发言。

例如，在一九六九年中期以后，看看财界的政治发言，五月二十三日，在经国联全体会议上植村会长关于增强防卫力量发表了下述谈话。

“越南和平的时机逐渐成熟，随着英国军队从东南亚撤退，东南亚的和平和安全就成了重要问题，日本自身的安全保障问题也成为大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作为我国在继续坚持日美安保体制的同时，逐渐增强自主防卫力量，在集体安保体制下，有贡献于维持远东和平的义务。这是国际的责任，这是关系到日本自身将来繁荣的重要问题。”

如果把这个演说的草稿拿给不知是谁讲话的第三者来看的话，恐怕同佐藤首相的施政方针演说没有不同之处吧？真可以说是政治臭气十足的财界首脑发言。

好像接受了植村的这个发言，同年五月二十八日，日本武器工业会提出了强化防卫产业的方针。日本武器工业会（会长大久保谦，三菱电机总经理）是由三菱重工业、三菱电机、新明和工业、川崎重工业、东京芝浦电气、日本电气等强有力的武器工厂八十八家组成的。强化国防产业方针是该工业会作为一九六九年度事业活动方针被提出来的。在这个活动方针里，在防卫产业方面确立协调体制，提出了国防技术的开发和交换情报，实现向东南亚输出武器，为强化防卫产业而强化扩大武器工业会，为提高战备思想，使官民协调提出了具体的目标和方向。

财界每年一到七、八月份召开的经营者讨论会，在一九六九年的主要议题都是清一色的防卫问题。

日本生产性本部（会长足立正）从七月六日到十一日在轻井泽召开了讨论会中，作为讲师团成员有新日铁董事长永野重雄、昭和电工总经理安西正夫、日产汽车总经理川又克二、日立制作所总经理驹井健一郎、川崎重工总经理砂野，日本电气总经理小林宏治、日本银行副总裁佐佐木直（后为总裁）等第一流财界人物一大排。以“七〇年代的经营”为题，与此相关连的自主防卫论、防卫力量增强论等进行了活跃的讨论。从八月七日开始的三天间，在山梨县富士吉田市由日经联主持召开的企业高级管理人员讲习会，一开始就以“七〇年代的政治经济问题的基本课题”为主题就自主防卫问题等从正面进行了讨论。

八月十八日，在日本商工会议所全体会议上也提出了所

谓安保问题是高度的政治问题，这是前所未有的事件。根据日商的规约，虽有不处理政治问题的规定，但新任会长永野重雄却发表宣言说：“关于保持日美安保体制等政治的、社会的问题也要积极行动起来”。

言犹在耳的樱田发言

日经联的代表常任理事樱田武甚至谈到宪法的修改问题。

一九六九年十月十六日，当日经联全体会议召开之际，出席了会议以樱田武氏首先致辞说，虽然经济达到了惊人的发展，但是政治方面出现了议会制民主主义的衰退和责任内阁制的软弱无力，在七〇年代要促进“政治的崛起”。而且谈到：“有良心的国民不仅期待着政府在执行国事活动中的决断，而且我认为修改宪法和选举法也是必要的。”财界领导人在公开场合发表修改宪法讲话在战后来说还是第一次。

当然像樱田这样地发言也使记者团大吃一惊，在记者会见场上又询问了其真意。对此樱田氏回答说：“在宪法修改中国防问题和两院制问题有两个目的。日本如果认真考虑自主防卫，宪法第九条应不应该维持原状是个疑问，在将来的集体防卫设想中勿宁说是成为恶魔的存在。还有现在的参议院的姿态也有很多问题，两院制也必须再检讨。”这个发言同财界的防卫力量增强论密切联系着，好像如实地简述了财界人的如意算盘。

“樱田发言”引起了巨大影响，首先是社会、公明、民社、共产等各党发表了批判樱田的谈话。例如社会党的江田书记长说：“樱田的发言是在美国从亚洲转移同日本垄断资本利益一致，自己要积极起到取代作用，向亚洲进行帝国主义的扩张，自主防卫是以向海外派兵为目标。要准备核武装化

的条件。涉及参议院制度的再检讨也是为修改宪法准备条件。”

日刊报纸对这个问题也大加宣扬。虽然在车站卖的N报（早版）解说道：“‘樱田发言’是财界‘鹰派’的发言”，可是到了一般家庭的最终版中“鹰派”云云的解说便无影无踪了。他们认为把樱田发言看成是财界鹰派的发言是不合适的。即报社领导人考虑到这样说是吐露了财界人的真情，而修改了原稿。终究不愧为是以财界派、体制派报纸自诩的这家报纸在第二天的社论中，把樱田发言改为“勇敢豪迈”的发言。连N报都是这么议论，其他日报的批评程度如何就可想而知了。

“代表舆论”的日报的动向，终究也制造了使政府、自民党有点紧张的表情，保利官房长官谈到：“修改宪法的是非从来就是个大问题，对此有各种各样的议论是理所当然的。可是政治领域必须以政党的各种政策作为基调。勿宁说经济界方面希望对当前成为问题的物价安定共同努力。”

持反对论的樱田

对于樱田发言的反响，特别是批判，当时樱田氏于十月二十八日敢于写成一千封信邮寄给国会议员、政府高官、主要审判官和报道机关等。樱田在这封信中列举五点再次强调了改宪的必要性。

一、二十五万自卫队员由于在宪法的解释上存在疑义，所以动不动就被看作是见不得人不合法的人。因此，自卫队员的征集和队员的士气，道德的发扬都不断地受到干扰。

二、每年支出五千亿日元的防卫费，将来还有可能增加。不管怎么说在宪法的解释上是暧昧的，作为纳税者是不能视而不见的。

三、限定自卫队的性质、机能纯粹是防御性质的，坚持文官优先的文官控制制度，明确非征兵制而是志愿制的方针等这些战力规定的方法都是值得欢迎的。

四、作为联合国的成员国为可能参加安全理事会所采取的军事行动而保持自卫军队是必要的，然而，像进行这样的合作在宪法的解释上有所谓疑义，因而修改宪法是必要的。

五、把宪法看成是不可侵犯的，回避现实采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主义”是不负责任的，我认为现在应该以国家舆论的统一的目標进行认真的讨论。

担任采访财界的新闻记者，就前面保利官房长官批判樱田的发言征求樱田氏的感想时，樱田只说：“天哪！我当总经理的时候，保利君还只是科长哟！”。在“樱田日清纺总经理”之下工作的“保利科长”对“上司”说什么都只说好吧。总之，樱田是非常自信的。像这样的自信不能光从樱田的个性出发加以考虑。原因是，樱田氏在全体会议上关于改宪发言的内容，实际上在会前印成了材料，事先分发给了政界和财界首脑人物。即政界和财界首脑人物在事先是知道了樱田的发言。在樱田发言的同一天十月十六日，访问了澳大利亚、新西兰回国的原岸信介首相也对记者团谈了修改宪法的必要性。当然，岸和樱田两人之间，事前有什么协商是不能想像的。可是，这些政界财界元老关于改宪问题，事前是不谋面合的吧！

危险的“大国主义”

那么，财界发出这样积极的政治发言的原因是什么呢？第一，这是大国主义思想的表现。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在资本主义国家里仅次于美国上升到第二位。于是，自卫队的存在仍然不能被承认，想要扩张军备是不可能的。由此，使以

美国为首的西欧同盟各国在对日本经济成长感到惊奇的同时，对于不对同盟国的防卫共产主义贡献力量的日本，给以具有讽刺意味称呼，称之为“经济动物”。而且，经济动物的先锋是财界，他们不顾日本国民和其他国家，拼命地追求利润，财界首脑自己也多少感到自己的弱点。因此，财界自己也要显示决不是为了“赚钱”而奔波的意思，以此表明对“国家一件大事”关心的政治发言，特别谈了增强防卫力量，尽管如此，用国民的税收来增强防卫力量，来转移来自社会的，国际的对财界的批判，不正是经济动物的先锋，财界首脑之流的作法吗？

第二、自民党的派系斗争，反安保论的扩散，大学问题的发生，从前时代的农业的崩溃等所带来的对保守基础的动摇，对此，使财界感到焦急，过度劳神。诚然，保守专政持续了二十几年，但与保守专政自身的“功劳”相比，不过是由于革新政党之间的混乱和分裂——“失败”所造成的持续政权。其证据是自民党的得票率在每次选举中总是一再减少，而在野党的支持率总是不断提高。这种自民党基础的相对下沉、还有党内的所谓新右派和少壮势力干部的动摇，表现出使党的团结遭到削弱。

一九六〇年日美安保修改当时自民党宣传所谓“安保关门论”，以此来试图证明增强防卫力量，日美军事同盟的“正确性”。可是，在日美军基地的存在，使之不断发生基地公害的同时，在越南战争中利用在日美军基地的事实，使国民对日美安保体制越来越感到不安。因此，在一九七〇年的安保中、就连安保关门论都不能脱了，专门以安保繁荣论、安保效用论来说服国民。“正因为有日美安保条约，日本以本国的防卫支出代替美国，能够促成自己经济的繁荣”

——有这样的理论，只是有日美安保条约的原故，在日美友好的名义下，日本以为还冲绳为交换条件，不得不代替美国对东南亚的经济援助。这样以来，不过多久连安保繁荣论也跟看着没有说服力了。

财界还对六十年代末开始升级的大学纷争和学生暴力，在七〇年代发展到企业内部青年工人的暴力极端恐慌，而且，就像大学的以前近代的遗制惹起学生暴力那样，比大学具有更古老的体质的民间企业里，那里都不能保证不发生暴力。尤其在财界的压力下实现了大企业中心的产业政策、经济成长政策，在一个方面把曾是传统的保守地盘的农村和中小企业置于生死存亡的危机线上。樱田氏的改宪发言是出于如何把动摇了的保守基础使其安定下来的心情。

由强化防卫力量来追求高额利润

第三，把自民党只当作财界的“派出机关”的想法。财界虽然大概都说是“政经分离”，供给为维持自民党生存而需要的政治资金的是财界，是自民党想说而不能说的由出资者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也是为逐渐开始动摇起来的自民党撑腰，而要进行积极地政治发言。

最后必须指出是财界贪得无厌地追求利润的姿态。前面提到财界大国主义思想、恐惧保守基础的动摇、把自民党作为“派出机关”等财界想法，因而如果把最初的政治发言看作是表面现象的话，那么，追求利润的姿态就是其政治发言的内在本质。

日本产业材料研究所曾估计说：“七〇年代前半期汽车，钢铁、家用电器要出现生产过剩。”这种生产过剩的恐怖，将在产业界不断发生渗透扩散。因此，产业界向宇宙、海洋、住宅产业到处伸手以求生存，这些新兴产业中伴有某

种冒险，政府对这些冒险产业中出现亏损的填补是无法予以保障。因此，引人注目的就是防卫产业了。

防卫产业的“买主”是政府，在付款可靠的基础上，如果一旦接受订货，就有逐年增大的性质。在武器方面伴随着“敌国”的装备和防卫技术的提高，必须不断更新有较强战斗力的武器。其最好的例子是三菱重工业公司，在战前曾经开发制造过“零式”战斗机、“武藏号”战舰、95式轻型坦克的三菱重工，自一九五〇年朝鲜战斗暴发以来，接受订货额年年增长，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八年接受订货额总计达到一千一百六十七亿六千万日元。接近于一九六八年度防卫厅发出的订货额的二千亿日元，这同汽车、电冰箱、彩色电视机的三种商品热之一的彩色电视机的生产额相匹敌。正因为如此，在一九六九年东京芝浦电器公司说把力量投入电子武器的生产，日立制作所宣称通过坦克的生产把力量投入国防生产上。

因此作为财界，越是增加防卫力量，制造商的订货额越要按增加计算。先前的日本武器工业会申诉道：“向东南亚进行武器输出，把防卫费增大到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四”。一九六八年度的国民生产总值为五十四万亿日元，如按百分之四计算，那就是两万二千亿日元。这是一九六九年度防卫费的四点五倍，政府予算的三分之一的巨额。

一九六八年度平均每户（一家四口人）只收入一百六十万日元，为修缮自家的房屋住宅一平方米一万五千日元以上的土地将来就买不起了（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三菱银行的预测），这就是日本人平均的生活实况。那怎么能负担得了一年二兆二千亿日元的防卫费呢？而且增强防卫力量的首要目标是我国的核武装，这不是迟早要走军国主义国家道路吗？财界在

今天更强调自己发言的影响，不要说是日本经济，也是为了领导日本的政治，要把财界四团体（经团联、日经联、经济同友会、日本商工会议所）统一化（一九六九年九月十八日，日本经济新闻）。战前，通过防卫生产的增加推进了国防国家、军事国家的产业报国会这个冒牌货又在死灰复燃，这样说也不算过分。而且，自民党对财界这种向产业报国化的进程加以阻止了吗？非但如此，而是以获得更多的政治资金为目标，迎合财界与之紧密勾结，变成为财界的承包人了。

以煽动对假想敌国的防卫思想来转移国内的矛盾，以增强由国民负担的防卫力量来克服生产过剩的危机，以追求增加利润为目标的财界的姿态，而又积极的政治发言，是违反国民利益的危险作法。对于像这样亲自破坏政经分离的原则，随更插咀政治问题，想要取得战后民主政治的财界，国民尤其在今天应该开始给以彻底的批判。